

七大洲 风云四十年 下

〔美〕赛·利·苏兹贝格

QIDAZHOU

FENGYUN

SISHINIAN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藏书★

K15/1

873

七大洲风云四十年

——回忆录萃编

下 册

[美]赛·利·苏兹贝格 著

朱士清 高雨洁 金人逸 译



天 津 人 民 出 版 社

C.L.Sulzberger
SEVEN CONTINENTS AND FORTY YEARS
A Concentration of Memoirs
Quadrangle/The New York Times Book Co.
New York, 1977

本书根据纽约“夸德伦格尔”/纽约时报图书公司1977年版译出

七大洲风云四十年

——回忆录萃编

下 册

〔美〕赛·利·苏兹贝格 著

朱士清 高雨洁 金人逸 译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9 5/8 字数 437,000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0

统一书号: 11072·55

定 价: 1.82 元

目 录

第 十 六 章	1961年4月——1961年10月.....	1
第 十 七 章	1961年11月——1962年11月.....	38
第 十 八 章	1962年12月——1963年12月.....	71
第 十 九 章	1963年12月——1964年10月.....	105
第 二 十 章	1964年11月——1966年2月.....	144
第 二 十 一 章	1966年3月——1967年4月.....	177
第 二 十 二 章	1967年4月——1967年11月.....	212
第 二 十 三 章	1967年12月——1969年2月.....	252
第 二 十 四 章	1969年2月——1970年5月.....	278
第 二 十 五 章	1970年6月——1971年3月.....	320
第 二 十 六 章	1971年3月——1971年12月.....	347
第 二 十 七 章	1972年1月——1972年8月.....	375
第 二 十 八 章	1972年10月——1973年9月.....	415
第 二 十 九 章	1973年9月——1973年10月.....	458
第 三 十 章	1973年10月——1973年11月.....	487
索 引		525

第十六章

316

1961年4月23日，巴黎

凌晨传来阿尔及利亚又发生政变的消息，情况不妙。诺斯塔德上午八点来电话，告诉我情况非常严重。他简直不明白夏尔将军怎么会发昏到陷了进去。直到现在还没有任何重要的政治家牵连进去。政府很着急，唯恐驻德法军宣布支持叛乱分子。

政府打算封锁阿尔及利亚，不采取军事行动，而用饥饿来逼降。叛乱者成功的希望渺茫，他们会遭到封锁，会被切断食物和金钱的来源。他们为了取胜就得来争取戴高乐，夏尔知道戴高乐对这些叛乱首领是不会客气的。但是有个大难题：不能指望任何人会向伞兵开火。

新的“秘密军队组织”同军队有联系。三个月前，伞兵和外籍军团的一些首领在策划阴谋。军团看来是这次密谋的主力。萨兰将军在马德里突然消失，料他将会在阿尔及利亚露面。在法国投掷塑料炸弹的人愈来愈活跃，看来同这项阴谋直接有关。

1961年4月26日，巴黎

诺斯塔德来电话，我们多少有点随便地在电话上进行了交

谈。拉里说，现在情况对戴高乐来说有好转，但是他“仍然不能排除法国的入侵”。

我们正在交谈，汤姆·芬勒特进来找我。他带来了他为肯尼迪出访戴高乐而准备的情况介绍草稿，上面标有“秘密”字样。汤姆说，这是他和加文共同搞出来的。（在我看来，这份材料正是我星期六随便向芬勒特介绍情况中的思想，只不过稍微系统些罢了。）汤姆是同阿瑟·施莱辛格一道来的，他问我是否愿意看看草稿，提点意见。我看了之后建议说，首先应当单独写一份分析戴高乐的个性和如何对付的论说性报告。汤姆问我是否愿意起草这个报告。我答应了，并于数日后将下列报告（缩写本）径交白宫。

秘 密

有关戴高乐将军的意见书

戴高乐作为一个强有力的个人，一位重要的有魅力的历史人物，对这一点我有深刻的印象。但是，他只是粗枝大叶地把事物看成是非此即彼。我认为他有许多概念不是错的、过时的，就是过早成熟的。至少是不适用于1961年5月31日的^①。

尽管如此，我还是试图照我感到的真实形象把他表达出来。他是我们必须与之打交道的一个人，不管他的思想是适宜还是不适宜，有理性还是完全没有道理。此人是今天法国政治的现实。虽然我们完全可以假定一项戴高乐以后的政策，但是我们同目前的法国打交道就意味着同戴高

① 指肯尼迪将要进行的访法会谈。——译者

乐打交道。

如果在会谈中只要戴高乐感到自己在被步步进逼，或甚至受到间接的威胁，他就会变得有礼貌却又是极端地强硬固执。他在对手面前愈感到地位软弱，就愈会变得难以对付……。

戴高乐有意仿效过去的大人物（其中多数是法国人），尽管他受到古典教育的奇特影响——在这方面，他更希腊化而不是罗马化，他极高地评价人类中的优秀者的个人品质和能力在影响时势方面的作用。细推敲起来，他解决问题的方法强烈地反映出他早年所学的亨利·伯格森的哲学，以及纯逻辑分析和直观的混合。如果要想对他的思路施加影响，最重要的是要记住他思想中的直观方面……。

戴高乐颐指气使，不可一世，其实他是个相当腼腆胆怯的人。人们知道他绝不是举止轻率的人，也没有多少幽默感，尽管他确实具有幽默感的素质。这种幽默感是否会显露出来，我想这要看会谈中关系的好坏了。

过去人们都知道他在密友面前很有模仿的天才。他嘲讽起来冷酷无情。他的一位老朋友曾把戴高乐豪爽而又幽默的风格形容为“重骑兵的技术”。

在进行更深的“心理分析”之前，我想说我认为戴高乐对青年人很有好感。在这方面总统和夫人年轻，有着一一定的有利之处，可能会触动他的善意。他喜欢年轻人。我猜想他在重大谈话之间的休息时，可能喜欢间或穿插些文雅 318 的欢乐和嘻笑，这种气氛在他中意的肃穆环境中是罕有的……。

戴高乐和他周围的许多人都依靠美国作为可以阻止战争的保护伞，在这种保护下，他们可以实施自己的计划：以挽回法国失去的某些地位。但他们对于不得不依赖这种暗含的保护并不喜欢。他们憎恶这种从未言明的从属地位。

戴高乐将军并不真正喜欢我们，而且他怀疑我们的动机，即使这些动机是无可置疑的。在这方面他特别敏感。但是他喜欢掩饰自己的怀疑和反应。他极不可能象操英语的政治家经常做的那样坦白地说出自己的怀疑和反应。相反，这些怀疑和反应往往蒙上一种礼仪周到的假象，使人们看不清楚。戴高乐是个精明老练的扑克能手，但要的是欧洲人的“全赢”^①。这点我们必须记住，不要欺骗自己。

戴高乐对美国之所以有这样的情感，原因有二。其一，美国现在是西方——欧洲及其他各地——的大国，而法国已落到了三等国家的角色。对此，他明显地感到不愉快。因而他甚至过分渲染华盛顿和伦敦之间非常亲密的关系。他感到英美之间有一种看不见的阴谋，目的在于阻止法国恢复它在第一次大战期间及其后所拥有的、尤其是在欧洲大陆上拥有的显赫地位。

第二个基本原因是他和美国人之间、法国和美国之间在二次大战时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戴高乐的记忆力很好。他永远也忘不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政策，首先是对维希和贝当元帅的态度，尤其突出的是对达尔朗海军上将，其次是对他本人的态度，以及扶植吉罗将军的最后

① 赌博用语，打牌时把赌桌上所有的赌注全部赢来。——译者

努力。①

戴高乐很不喜欢罗斯福，也很不喜欢杜鲁门。他认为美国的政策是有意发展“第三种力量”，这种力量在他最初试图通过他的法国人民大会重新掌权时将会阻碍他……。

我认为，一俟北非问题在谈话中势必提出（我强调“势必”一词是因为我不能肯定这个问题是否应由我方提出），我们必须处理得柔和。我们一方面应该赤诚陈言，但同时方式上又要竭尽巧妙之能事……。

我的想法是，在开始认真地交换意见时，我们的行事方式应该是“重要的事情放到最后来解决”。换句话说，如果总统能尽早抓住时机将话题转到华盛顿和巴黎之间本来就一致的问题上来，那么我认为一种较为有利的气氛就会出现。

一致的方面确乎存在，而政治讨论一开始就应该集中在这些方面。其中最重要的大概是德国问题。尽管有共同市场的存在，尽管目前戴高乐和阿登纳之间的关系密切，戴高乐对德国还是满腹狐疑。虽然他不喜欢陈词滥调，但是一讨论这个问题他就不免要重弹起来。

他预料，除非西德牢牢地同西方拴在一起，否则阿登纳以后就会出现一段神经紧张的时期。他认为莫斯科会给波恩尝到新的甜头，“克虏伯”们会迫使阿登纳以后的政府（艾哈德或施特劳斯）接受某种关于统一德国的交易，也许会以邦联为基础。这样就会把西德从西方阵营中夺

① 罗斯福当时的政策是与维希政府保持关系，不理睬戴高乐的自由法国。

——译者

过去。

不妨指出，北约组织的一个基本政治宗旨，就是不仅保证德国（因而也是法国）要有足够的防御，而且要保证德国将同法国和盟国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样，只要北大西洋公约存在，德国就不能自行挑起任何冒险的行动。

眼下我担心的是，要把法国军队与北约组织一体化的计划，能否取得任何大的进展，希望极微。但是我们可以不无益处地强调指出，有必要继续鼓励德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同联盟的一体化。

很明显，戴高乐很不喜欢我们关于北约组织或联合国的概念。我发现，过去十年来他对北约组织态度的唯一改变是，他虽曾一度极其讨厌这个联盟，而且随时准备完全退出，而现在他准备容忍这个联盟了，但只是给予最低限度的支持。

在这方面，我认为总统请戴高乐惠予帮忙，从心理上看来可能是合适的，这就是要求法国不要公开反对我们在联合国内为加强自由世界的事业所进行的努力。

（我特别用了“请帮忙”这个字眼。戴高乐是非常通人情的。如果要求他对一个他在理智上承认而感情上并不承认的大国“给予”什么的话，我猜想他心里也许会感到很舒坦。用奥威尔^①的观点来说，这可能使他感到“更加平等”。如果这种感触在戴高乐心中得以增强，事情就可能好办些。）

^①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50），英国小说家，其作品以论及人类自由问题为特点。——译者

说得更明确些，我虽然并不喜欢想要“讨好”戴高乐，但是向他指出下面一点将是明智的，即我们多么乐于看到法国在原法属非洲殖民地的文化遗产（可惜不会延续多久了），能有助于使许多前法属殖民地国家在联合国大会上支持西方的事业。

在这方面要是出现合乎理想的气氛，就可能适于两位总统就“非殖民化”交换意见了。戴高乐对这个问题特别敏感。他现在处于极端矛盾的地位。1940年6月以后他就一直为恢复整个法兰西帝国而奋斗——主要是针对罗斯福先生的思想，而自从他三年前重新上台以来，他一直在设法一块一块地放弃这个帝国，以免整个地损害法国的地位。

阿尔及利亚是所涉及的最后一个重要地区，也是他和所有法国人最为敏感的地区。即使在这个地区，三年来他的政策也是非凡地始终如一的，尽管在公开场合有一些明显矛盾的策略上的转变。

两位总统能否老练巧妙地、颇有裨益地讨论非殖民化、以及西方如何保证刚刚独立的亚非国家（阿尔及利亚也好，老挝也好）能摆脱共产主义等问题？谈到这些问题时，肯尼迪总统不妨就古巴和所有南美和中美国家的问题去“请教请教这位将军”，这样做可能会是合适的。

我们不一定要照他的意见办，他也不见得要照我们的意见办。然而，这却是他心中认为的协商，就是他那被讹 320 称为三国核心领导的建议。

戴高乐要求华盛顿对待法国同对待英国完全一样。我认为那个所谓三国核心领导，其实是他对建立一个三巨头

协商机构十分醉心，用这个机构来协商他称谓的“西方政策”——不是对北大西洋公约内部，而是对北大西洋公约以外的地区的政策。

关于核武器方面的安排，这是个极端重要的问题。我冒昧地说，这一定得由肯尼迪总统提出来。如果总统不提，我想戴高乐总统恐怕就不会提了。因此我认为，我们必须用心地选定一个从心理上说十分合适的时机，然后再提出这个问题。而且，不论我们对这位将军提出多么慷慨的建议（即使在解释了美国国会批准方面的困难之后），我们也应当准备戴高乐作这样的表态，他会说，他实际上并不想从我们这里得到任何有关原子的协助。

他对白色人种和其他人种之间那种邪恶的种族分离有一种模糊的概念，有些象二十年代威廉·兰道夫·赫斯特的想法。他在一段时间以来总把苏联看成是“永恒的俄国”，而不是强大的共产主义国家。他总觉得统治俄国的白人到头来总会归顺于西方的；他认为他们的意识形态是一种瞬息即逝的事物，因为他们的南部和东部边境有一个以中国为首、最终会得到日本帮助的巨大的非白人集团在威胁着他们。

总起来说，我冒昧地提出我的意见：在美法两国的心理关系中，要企望会谈取得圆满成功，我们的行政首脑就应记住下列四条原则：

一、我们是个强国（因而在同这位高傲不屈的人会谈时就身处不利），必须要有容忍而且乐于倾听意见的态度。

二、在会谈中我们绝不可压戴高乐，而聪明的办法是

设法诱导他共同进行讨论。一当他感到地位软弱、处境不利时，他是很难对付的。

三、不论气氛有多友好，我们也绝不可忘记：他对美国的猜疑胜于对我们的尊重，尽管他知道他要依赖我们。他认为，由于地理原因和当代历史的发展规律，我们几乎也同样地有赖于他。

四、最后，我极力主张，当认真的会谈开始时，应尽可能地先从那些法美政策显然是基本一致的问题谈起。

1961年4月27日，巴黎

今天上午我同诺斯塔德作了一次长谈。他把他在法国危机期间同华盛顿来往的电报给我念了。他建议我们应该给予协助，但要非常谨慎，不要把任何援助“强加”给一个“已经很敏感和负担过重的政府”。321

我们具体做的事情（并告知法国人的）是，向美国的部队发出特别命令。我们通知空军部队，如果有人要来夺占设施，应设置障碍物予以阻挡，不要开火射击。这就是说，如果机场的雷达系统发现有意外的飞机飞来，机场应该用卡车来作掩护。

1961年5月6日，巴黎

同西班牙前驻美公使、现驻法大使阿莱尔萨（莫特里科伯爵）共进午餐。此人讨人喜欢，也挺有意思。

莫特里科说，他事先得到密告，说最近这次反戴高乐的暴乱计划，第一步就是在总统星期五晚上在戏院观看官方组织的演出时暗杀他。他将这个情报告诉了在爱丽舍宫的若弗里·德·库

塞尔。

1961年5月14日，日内瓦

同迪安·腊斯克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这是他任国务卿后我同他的第一次会面。老挝会议即将举行。我认为在十七度线将老挝一分为二比建立一个联合政府更可取，而且这是我们能够拯救南越的不二法门。他的看法怎样呢？他说：“分裂不能解决南越问题。共产党早已通过老挝一直在向南越渗透。当然如果老挝完全归了共产党，渗透的问题就会严重百倍。坦率地说，我们宁愿要个中立的老挝，而不要分裂的老挝。”

同腊斯克的副手艾夫里尔·哈里曼共进午餐，时间很长。腊斯克一回国，老挝这个棘手问题就要留给艾夫里尔来处理，正如1954年杜勒斯把越南这个棘手问题交给比德尔·史密斯那样。艾夫里尔心情相当不好，他看来比他的上司更倾向于用分裂办法来解决问题。他吐露说：“我还不是这届政府的内圈人物。除了有关古巴的电报外，所有的电报我都能看到。但实际上我不是最知内情的。我认识总统有一段时间了，但了解得甚少；他总是称呼我为‘州长’，而不是‘艾夫里尔’。但是我相信，在事情结束以前，我会成为内圈人物的。我同罗斯福的关系开始时做他的私人朋友，后来就到了最高层；继而我同杜鲁门的关系得重起炉灶，又从私人朋友作起，后来到了最高层。我现在打算再这样干起。”

艾夫里尔是不会接受任何一个有共产党人任外交、国防、
322 内政或司法部长的老挝中立政府的。共产党只能占次要的职位，即便如此也是危险的。有人告诉过他，一个共产党的宗教事务部长曾成功地做到了对和尚们的渗透。

在进餐的当中，艾夫里尔曾说，他估摸着他在这里扮演的角色就象“替罪羊——比德尔·史密斯”那样。他认为美国可能不得不出兵东南亚。如果这样，我们就会请来巴基斯坦、菲律宾和泰国的军队。美国部队的规模不大也不小。

1961年5月30日，巴黎

在午餐会上，乔治·鲍尔告诉我，肯尼迪去见麦克阿瑟将军时，这位将军对他说：“你象一只老母鸡，你的小鸡都遭到了厄运，而自己却还活在笼子里。”

1961年6月2日，巴黎

下午，我同肯尼迪总统在凯多赛他的房间里谈了四十分钟，这是他入主白宫后第一次同我谈话。他在爱丽舍宫向戴高乐进行辞行拜会。我在他秘书办公室里正眺望窗外，他和他的一行人马从那里回来了。

他一开始就说：“我想我们最好先讲清楚这次谈话的目的，是为了记录，还是作为背景材料，还是为了别的什么用处？”我说如果允许我记录，我可真走好运了。他说：“伙计，赛伊，我还是不许你记的好。你知道，一路上那些家伙一直围着我。我要是让你记录，那就非找倒霉不可。”而后他又说：“请你替我保密。千万别露出马脚让人看出你见到了我，也别告诉任何人。我谁都没见呢，所以你得给我保密。”

他说，我送给他的材料“无比宝贵”，“非常有用”。我曾向他建议，为了酝酿解决棘手问题的有利气氛，最好的策略是最主要的问题最后谈。我问肯尼迪他是不是这样做的，他笑了，说他就是这样做的。他们从柏林问题开始，然后谈到亚

洲、非洲、拉丁美洲等问题，最后才涉及要谈的正题。他说柏林问题很容易谈，因为我们事先都清楚我们双方是一致的。

我问他，我们是否要给法国人任何导弹援助，因为这并不需要修改麦克马洪法。他说这个问题正在研究。我们在考虑让法国得到这种技术装置，例如制导系统。但是我们首先得看我们在日内瓦禁试谈判中的进展怎样。虽然导弹问题不涉及麦克马洪法，同日内瓦谈判也无直接关系，但间接地却是有牵连的。眼下极为重要的是，我们不应被看来是在主动扩散核军事力量。再者，如果我们给了法国人这样的援助，德国也会向我们施加巨大的压力来要求分享。

我们现在是否准备在北约组织地区内外同法国协商时，把它同英国完全等同对待？他毫不犹豫地答道：“毫无疑问。”然后他又说：“我们要从各方面来改善协商程序。”

我们是否准备在任何情况下同赫鲁晓夫达成使双方承诺不在对方地区内进行宣传和颠覆活动的任何种类的协定？他认为提出这个建议并不会使赫鲁晓夫感到兴趣。他认为，从俄国的观点来看，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曾在1933年试过一下，达成了罗斯福—李维诺夫协定，当然它没起作用。

我说，赫鲁晓夫曾说过，他反对战争，但“民族解放战争”除外。他赞成民族解放战争。这个保留是否使我们也说，我们赞成从我们的观点看的民族解放战争？肯尼迪说，地区性战争会引起“升级”的问题。任何这类地区性的战争和外界所承担的义务都有发展成大战的危险。我们对此很关切。老挝危机就是这类情况的一个例证。他说，同戴高乐的谈话“非常有益”，对他（肯尼迪）有极大的帮助。戴高乐详细地解释了他对法国的看法，他的责任和希望。这次会谈也有助于使戴

高乐对美国的政策有了真正的印象。

这次协商过程特别宝贵，因为我们和法国人在许多地方都是牵连在一起的。肯尼迪也承认，法国人非常怀疑我们同英国有秘密协商条约，但是他说他在这方面作了些工作，消释了一些疑虑。他还说：“我们同英国协商较密，因为英国人容易协商。我们的思想观点有着某种共通的地方。但是现在我们正设法改善同法国的协商程序，因为法国同我们在许多地方都牵连在一起，而那些地方我们都有着利害关系，如非洲和老挝。法国人毕竟是根据日内瓦协议呆在老挝的，而我们却不是。”

他把话题又回到戴高乐对美国的疑虑上，他说：“你说得很对（指我送给他的材料）。他的反美情绪和疑虑早已有之，而且根深蒂固。”

仅仅是出于对法国愿望的尊重，所以这一次以背景材料的形式透露出来的东西不多，“戴高乐对新闻界的看法你是知道的。我们必须迁就他。但是我没有必要告诉你这些，你是非常熟悉戴高乐的。”

1961年6月5日，巴黎

324

汤米·汤普森和奇普·波伦同腊斯克一起从维也纳回来向北约组织通报肯—赫会谈情况。奇普今天下午将同腊斯克去爱丽舍宫向戴高乐介绍情况。汤米对我说，我不去维也纳是明智的，那里简直闹得不可开交。看来赫鲁晓夫唯一可以让步的是在老挝问题上，因而这也是唯一可能达成协议的迹象。

赫鲁晓夫明白表示，他打算在东德条约和柏林问题上继续行动，但却没有规定时间表。肯尼迪警告赫鲁晓夫说，在柏林